

鲁迅论中国美术遗产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广州美术学院文艺理论教研组 编印

1979.5.23

59

前言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根据培育革命美术战士和发展革命美术事业的需要，对于美术遗产特别是中国美术遗产，给予高度的重视。他在紧张的战斗的几十年中，对于中国美术历史资料的蒐集、研究、宣传 and 选编出版方面，倾注了大勇心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鲁迅虽然没有留下有关中国美术史的系统的著作，但他在许多杂文、序言、后记和信札中，对于中国美术历史遗产发表了一系列极其精辟深刻的见解，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以至将来，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指导意义。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研究中国美术历史遗产的光辉典范。

在这里我们将鲁迅有关中国美术遗产的论述摘抄出来，大致按时代顺序和内容性质加以排列刻印，作为中国美术史课的学习、研究资料。

鲁迅在中国美术遗产方面所进行的工作，所持的态度，所作的论述，那怕是片言只语，对我们美术史工作者来说，都是可贵的启示，都有至要的价值。但完全石而完空地认识鲁迅在美术历史科学上的贡献，仅凭这些材料是远远不够的，那不仅要联系当时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的实际，掌握他对外国美术遗产所做的蒐集、整理、翻译、评介分析工作的情况，而且还应结合他在整个文学艺术史研究中的所有著作和见解。

这里所辑录的鲁迅关于中国美术遗产的论述，来自有关中国美术遗产问题的专文的是很少的；大多是摘自谈论美术创作问题和关于蒐集、选编出版美术资料的信札中的片段；有一些则是为了论证其他问题而举例中涉及美术史上某一人物或作品，本忘却并不在于对所举人物或作品的评价；鲁迅关于中国美术遗产的见解，大都具有根本性的普遍性的意义，但也必须注意，他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具体的情况而发的，显然我们应当领会他的精神，从中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应当把它们当作现成的结论或僵死的教条来看待。

限于我们的见闻与知识理论水平，遗漏或摘录、编排不当

· 2 ·

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切期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补正。

辑录者：陈少丰

薄松年

1979.5.23.

(一) 关于美术遗产的批判继承

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翻在地。

《(忽然想到)(六)》(1925.4.18)

《华盖集》35页

……虽然材力很小，但要介绍些国外的艺术作品到中间来，也选印中国先前被人忘却的还能复生的图案之美。有时是重提旧时而今日可以利用的遗产，有时是发掘现在中国时行艺术家的在外国的祖坟，有时是引入世界上的灿烂的新作。

《艺苑朝花》广告(1929.4)

《集外集拾遗》478页

古之雅人，曾诮妇人俗子，看画必问这是什么故事，大可笑。中国的雅俗之分就在此，雅人往往说不出他以为好的内容来，俗人却非问内容不可。从这一点看，连环图画是宜于俗人的，但我在《连环图画辩护》中，已经证明了它是艺术，伤害了雅人的高超了。

《调潮印木刻》(1933.11.6)

《南腔北调集》161页

我对木刻的介绍，先有梅斐尔德(Carl Meffert)的《士敏土》之图；其次，是和西谛先生同编的《北平笈谱》；这是

第三本，因为都是采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但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雄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介绍，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引玉集〉后记》（1934.1.20）

《集外集拾遗》431页

……古今的名画，也有可以采取的地方，都要随时留心，不可放过，日积月累，一定很有益处。

《致陈烟桥》（1934.3.28）

《鲁迅书信集》511页

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专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取，便发生了“印象派”，有谁说印象派是中国画的俘虏呢？专学欧洲已有定评的新艺术，那倒不过是模仿“达达派”，是装鬼脸，未来派也只是想以“奇”惊人，虽然新，但我们只要看 MAYAKOVSKY 的失败（他也画过许多画），便是前车之鉴。既是采用，当然要有条件，例如为流行计，特别取了低级趣味之点，那不消说是不对的，这就是采取了坏处。必须令人能懂，而又有益，也还是艺术，才对。《毛哥儿》虽然失败，但人们是看得懂的。陈静生先生的连环图画，我很用心的看，但老实说起来，却很费思索之力，而往々还不能解，我想，能够一目了然的人，恐怕是不多的。

《致魏猛克》(1934.4.9)

1977.2.19.《光明日报》

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

《论〈旧形式的采用〉》(1934.5.2)

《且介亭杂文》18页

……一方石还正在绍介欧美的新作，一方石则在模印中国的石刻，这也都还是中国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木刻纪程”小引》(1934.6)

《且介亭杂文》36页

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塚中枯骨，换了新装，牠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内心的一致要求……。

曾被看作高尚的风景和静物画，在新的木刻上是减少了，然而看起出品来，这二者反显著着较优的成绩。因为中国旧画，两者最多，耳濡目染，不觉见其久经撮取的所长了；而现在最需要的，也是作者最着力的人物和故事画，却仍不免有些逊色，平常的器具和形态，也间有不合实际的。由这事实，一石固足见古文化之裨助着后来，也束缚着后来，但一石也可见入俗之不易了。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1935.6.4)

《且介亭杂文二集》99—100页

画也要训练。十九世纪末的那些画派，不必说了。就是
常的动植物图，我曾给向从来没有见过图画的村人看，他们
不懂。立体的东西变成平石，他们就万想不到有这种事。
*我主张连环图画，要多采用旧画法。

《致赖少麒》（1935.6.29）

《鲁迅书信集》838页

（二）关于原始、商、周时期的美术

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
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

《经验》（1933.6.12）

《南腔北调集》104页

夏禹的“峿嵎碑”是道士们假造的；现在我们能从实物上
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文和钟鼎文。但这些，都已
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
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从这图形上，又能
发现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

《门外文谈》（1934.8.16）

《且介亭杂文》69页

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至年不洗之理，
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
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
变化了我衡考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彫刻罢，我总以为它现
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

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彫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肉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认为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题未定”草(七)》(1935.12.18-19)

《且介亭杂文二集》178页

(三) 关于汉代美术

(1) 南阳汉画像石

十一日信并《南阳画像访拓记》一本，顷同时收到。关于石刻事，王冶秋兄亦已有信来，日内拟即汇三十元去，托其雇二推拓，但北方已冷，将结冰，今年不能动手亦未可料。印行汉画，读者不多，欲不赔本，恐难。南阳石刻，关有益有述印本（中华书局出版），亦多凡品，若随得随印，则另屋者多，未必为读者所必需，且亦实无大益，而需巨款则又另一问题也。

我曾陆续收得汉石画家一篋，初拟全印，不问完或残，伎其如图目，分类为：一，摩崖；二，阙，门；三，石室，堂；四，残杂（此类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若大，遂止；后又欲选其有关于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而刻划又较明晰者，为述像，但亦未实行。南阳画像如印行，似只可用述印法。

《致台静农》(1935.11.15)

《鲁迅书信集》907页

……拓汉画款，先已寄去卅，但今思之，北方已结冰，难施墨，恐须明春矣。关有益本实未佳，价亦太贵，倘乎述而转印，于读者当更有益。……

《致台静农》(1935.12.3)

《鲁迅书信集》916页

南阳杨君，已寄拓本六十五幅来，纸墨俱佳，大约此后尚有续寄。将来如有暇豫，当并旧呈迭印也。

《致台静农》(1935.12.21.)

《鲁迅书信集》926页

今日收到杨君寄来之南阳画像拓片一色，计六十五张，此后当尚有续寄，歟如不足，望告知，当续汇也。这些也还是古之荆人的冢墓中物，有神话，有变戏法的，有音乐队，也有车马行列，恐非“土财主”所能办，其比别的汉画稍粗者，因无石壁画象故也。石室之中，本该有五石铜镜之类，大约早被人检去了。

《致王冶秋》(1935.12.21)

《鲁迅书信集》926页

(2) 孝堂山和武氏祠画像石

武氏祠画像新拓本，已颇模糊，北平大约每套十元上下可得。又有“孝堂山画像”，亦汉刻，似十幅，内有战斗，刑戮，卤簿……等图，价或只四五元，亦颇可供参考，其一P分，亦在《金石索》中。

《复姚克信》(1934.2.20.)

《鲁迅书信集》493页

关于秦代的印章文物，我也一无所知，耳目所及，也未知有专门的学者，倘查书，则夏曾佑之《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价三元)最简明。生活状态，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此像《金石萃编》及《金石索》中皆有复刻，较看拓本为便，汉时习俗，实与秦元大异，稍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

《致姚克信》(1934.2.11)

《鲁迅书信集》488页

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或雕刻古来的帝王、孔子弟子、烈士、列女、孝子之类的图。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还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我仿佛记得那上石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但现在手头既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

《朝华夕拾·后记》

(1927.7.11)《朝华夕拾》85页

然而倘是画像，却也会间或遇见的。我曾经见过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语》里的揅画；一次是梁啟超氏亡命日本时，作为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的卷头画，从日本倒输入中国来的；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揀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枝杖，然而从来不发，非常威风凛凛的。假使在他的旁边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笔直，经过两三点钟，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935.4.29)《且介亭杂文

二集》79页

瞿木夫之《武梁祠画像考》，有刘翰怡刻本，价钿而难得，然实不佳。瞿氏之文，其弊在欲夸博，滥引古书，使其文浩々洋々，而無裁择，结果为不得要领。

《致台静农》(1935.11.15.)

《鲁迅书信集》907页

石刻画像，除“君车”残石（有阴）外，翻刻者甚少，故几乎无须鉴别，惟旧拓或需向人。我之目的，（一）武梁祠、孝堂山二种，欲得旧拓，其佳者即不全亦可；（二）嵩山三阙不坏；（三）其余石刻，则只要拓本较可观，皆欲收得，虽与已有者至出亦无害，固可比较而取其善者也。但所谓“可观”者，系指拓工而言，石刻清晰，而拓工草率，是为不“可观”，倘石刻既已平漫，则虽图象模糊，固仍在“可观”之列耳。

济南图书馆所坐石，昔在朝时，曾得拓本少许；闻近五六年中，又有新发见而搜集者不少，然我已下野，遂不能得。兄可否托一机关中人，如在大学或图书馆者，代为发函购置，实为德便。……

《致台静农》(1934.6.18.)

《鲁迅书信集》578页

对于印图，尚有二小野心。一、拟印德国版画集，此事不难，只要有印费即可。二、即印汉至唐画家，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狩猎，宴饮之类，而着手则大不易。五六年前，所收不谓少，而颇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画像》、《孝堂山画像》、《朱鲋石室画像》等，虽具有，而不中用，后来出土之拓本，则皆无之，上海又是商场，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补收否？即一面收新拓，一面则觅旧拓，（如上述之三四种），虽至出不妨，可选其较精者付印也。

《致台静农》(1934.6.9.)

《鲁迅书信集》574页（尾注此
佚不全）

(3) “朱鮪石室画像石”及其他

汉画像中，有所谓“朱鮪石室画像”者，我看实采晋石，上绘宴会之状，非常生动，与一般汉石不同，但极难得，我有一点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万不可放过也。

《复姚克信》(1934.3.6.)

《鲁迅书信集》500页

朱鮪石室画像我有两套凑合起来似乎还不全，倘碑帖店送有缺套来，则除先生石石外，其余的请替我买下，庶几可以凑成全图。这石室，四五年前用泥塞起来了（古怪之至，不知何忌），未塞之前，掘了一次，闻张继委员有一套，曾托人转辗去借，而亦不肯借，可笑。

《复姚克信》(1934.4.22.)

《鲁迅书信集》529页

子民先生左右：谨启者，汉石刻中之人首蛇身像，就树人所收拓本观之，除武梁祠画像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颇难观也。今附上三枚：

- 一、南武阳功曹，乡啬夫文学掾平邑口即东阙画像。（南阙有记云，章和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山东费县平邑集，此像颇清楚，然亦有一人抱之左右，有朱鸟玄武。
- 二、嘉祥残画像（旧为城内轩辕氏所立，今未详所在，像已漫漶，亦有一人持之。
- 三、未知出处画像。（从山东来，此像甚特别，似二人在树下以尾相缠，惜一人已泐）

（一九二三年）一月八日周树人启上。

（据手稿抄录，原件无标点）

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资料》

1977. 11. 文物出版社

……“若车”画像确系赝品，似用砖翻刻，连璽高印也是假的。阮刻之拓片，还委有神彩，而且必连碑阴，乃为全份。又包中之“曹望禧造象”，大约也是翻刻的，其与阮刻不同之处，见《枝碑随笔》。

从这两包中，各选数种，目另列，其余的已于昨日寄回了。收集画像事，拟暂作一结束，因年来精神体力，大不如前，且终日劳人，亦无奎理付印之望，所以拟姑置之；……

《致台静农》(1935.5.14)

《鲁迅书信集》811页

汉唐画像极拟一选，因为不然，则数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但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然竟想不出一个适宜之处，不过无论如何，此事终当了之。

《致姚克》(1934.4.9)

《鲁迅书信集》521页

(4) 汉代美术的优良传统

惟汉人石刻气派深沉雄大，……倘取入木刻，或可另闢一境界也。

《复李桦信》(1935.9.9)

《鲁迅书信集》873页

汉画像模糊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较的清晰，但不易得。我在北平时，曾陆续蒐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

印以传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

《复姚克伉》(1934.3.6.)

《鲁迅书伉集》500页

汉唐画象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糊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倘无暇，无力为此。先生见过玻璃版印之李毅士教授之《长恨歌画忌》没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实乃广东饭馆与“梅郎”之流耳，何怪西洋人画数千年前之中国人，就已有了辫子，而且身穿马蹄袖袍子乎。介绍古代人物画之事，可见也不可缓。

《复姚克伉》(1934.3.24.)

《鲁迅书伉集》506页

石刻画象印起来，是要加一点说明的，先生肯给我译成英文，更好。但做起来颇不易，丰年也未必肯看，聊尽自己的心而已。

《复姚克伉》(1934.4.22.)

《鲁迅书伉集》529页

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象，……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复李桦信》(1935.2.4.)

《鲁迅书伉集》476页

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

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美乎”牛羊的。

《论“旧形式的采用”》

(1934, 5. 2.) 《且介亭杂文》

16页

一石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石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麋鹿，沿边是一圈小飞禽。古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但我的一石并无海马，其实和名称不相当，记得曾见过别一石，是有海马的，但贵极，没有买。这些都是汉代的镜子；后来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纹可造粗拙得多了。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葡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物的装饰。古时对外来物品，每加海字，如海石榴、海红花、海棠之类，海即现在之所谓洋，海马译成今文当然就是洋马。镜鼻是一个螭螭，则因为镜如满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汉事不相干了。

《看镜有忌》(1925. 2. 9.)

《坟》162页

遂想汉人多少因循，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称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现今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隻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革书，一个俗字。噫？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用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的。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不乎，只得萎缩，死掉了。

《看镜有忌》(1925. 2. 9.)

《坟》162—163页

宋的文艺，现今似的国粹气味就薰人，然而辽、金、元陸續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品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彿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王和奴隶的宝贝。

《看鏡有感》(1925.2.9.)

《坟》163页

印盖始于周秦，入汉弥盛，所以封物以为验，故其文止于官守名氏。后世慧事，益多其制，多壁刊勒，古法荡然。元吾丘子行力主义法，世稍々景附，乃复见尔雅之风，至于今不绝。夫秦书八体，五曰摹印，施于印玺，汉氏因之。今秦铭希有，而汉印时见一二，审其文字，大都方正句曲，绸缪凑合，又能体字画之忌，有自然之妙；视盘旋回转，以曲线取胜者，相去盖远。又古之印章，执政所持，作信万国，故铸凿之事，必有世守之法度，可为后来准的；铁书之宗以铜，固非徒以泥古故也。……。嘗闻艺术由来，在于致用，草昧之世，大朴不雕，以给事为足；已而渐见藻饰，然犹神情浑穆，函无尽之忌，后世日有迁流，仍不能出其封域。故欧士言图绘彫刻者，必溯希腊，凡玉物之浮彫，土缶之彩绘，不以沉埋掩其辉光，以校后之名世著作，且隐然为之先导，饰文字为观美，虽华夏所独，而其理极通于绘事；况知以汉法刻印，允为不劣之程，夫岂逞高心，以为眇论哉。

《(蜕龕印存)序(代)》1916年

《集外集拾遺》52页

(四) 关于晋、唐的美术

至于为专年着想的普及版，我以为印明本插画是不够的，因为明人所作的图，惟明事或不误，一到古衣冠，也还是借不住，武梁祠画像中之商周时故事画，大约也如此。或者，不如（一）选取汉石刻中画像之清晰者，晋唐人物画（如顾恺之《女史箴图》之类），直至明朝之《圣谕像解》（西安有刻本）等，加以说明；（二）再选六朝及唐之士俑，记善画者用线条描下，（但此种描手，中国现时难得，则只好用照相），而一一加以说明。专年心粗者多，不加说明，往々连细看一下，想一想也不肯，真是费力。但位高望重如李敏士教授，其作《长恨歌图记》，也不过将梅兰芳放在广东大旅馆中，而边士则穿着八卦衣，如戏文中之诸葛亮，则于专年又何责焉呢？日本人之画中国故事，还不至于此。

《致郑振铎》（1934.6.21.）

《鲁迅书仗集》584页

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亦无世界史，妄人顺口开河，专年莫名其妙，知今知古，知外知内，都谈不到。当我年专时，大家以鬚髯上翘者为洋气，下垂者为国粹，而不知这正是蒙古式，汉唐画像，鬚皆上翘，今又有一般小英雄，以强水洒洋服，令人改穿袖子马褂而后快，然竟忘此乃满洲服也。此种谬妄，我于书评中已曾屡次提及，然无效，盖此本不读书耳。

汉唐画像极拟一选，因为不然，则故年收集之，亦殊可惜。但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乱其间，如在洪炉上石，能躁而不能静，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然竟想不出一个适宜之处，不过无论如何，此事终当了之。

《鲁姚克仗》（1934.4.9.）

《鲁迅书仗集》520页

《列女传》翻刻而又翻刻，刻死了。宋本大约好得多，宋